



百姓秋叶丛书

花 蕾 总主编

花
蕾
武玉栋
主
编

敌机撒来的

Diji Salai De Chuandan



挖人祖坟的报应
愤怒的地瓜
我的知青岁月
反“封、资、修”文件
早春登岛斗苏修
四斤面与八年徒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百姓秋叶丛书

花 蕾 总主编

花

蕾

武玉栋

主
编

敌机撒来的传单

Diji Salai De Chuand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敌机撒来的传单 / 花蕾 武玉栋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5
(百姓秋叶丛书)
ISBN 978-7-5500-0347-7

I. ①敌… II. ①花…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479号

敌机撒来的传单

花 蕾 武玉栋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越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47-7
定 价	2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12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百姓秋叶”丛书

从公元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喜怒哀乐错综交加的岁月。大事小事、好事坏事,老百姓们无法避免地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把这些渐渐抛在了车后;“正史”的记载疏略简陋,使之日益模糊不清;而且,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正在相继进入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物,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景象,都会慢慢湮灭;也许,在久远的将来,后人会因为这宝贵财富的丢失而一边捶胸顿足,一边苦力考证。仅就20世纪下半叶两件史无前例的大事而言,时在今日,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土地改革”运动的细节,有多少人还能说得清“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基层是如何燃起的?

龚自珍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身为匹夫,我不自量力地产生了避免以上担心成为现实的想法,进而有了编纂“百姓秋叶”丛书的行动。

本丛书之所以取名为“百姓秋叶”,概因为其宗旨是:凡人琐事,再现岁月风貌;细枝微叶,勾画历史巨树。普通百姓的往事记忆,像历史巨树上飘零的秋叶。然而,正是这些微琐的碎片,曾经成就了历史巨树,并且毫无掩饰地见证着历史巨树真实的一切。

芸芸众生既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者,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者。看上去他们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他们正是历史风雨的直接承受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的主人和证人。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乃是构建所谓大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最坚实、最鲜活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很难见诸囿于某种观念和规定而撰写、出版的文字中,以至于像一些史学前辈所不满的:“哪一



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

大大小小的普通人对亲身经历过的岁月的证言，形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的无数细节。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残缺的、不可信的，一如没有枝叶的树干，即使参天入云也缺乏生命，只能称为枯树而已。

“百姓秋叶”丛书力求作者广泛化。无问弄书种田、贩夫走卒，都可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带着那个时代特征的事或人忆写出来，贡献出来。尤其欢迎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品（无力亲自动手者，委托他人代笔整理也可）。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坚持短小精炼、朴素真实。无需优美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不用深刻的评论和高度的概括，只求以白描的手法、简单的文字，详细地记录下真实的人和事。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既可追忆当年的喜乐，也可回溯曾经的哀怨——只要把真实的亲历奉给社会，留给后人。

在饱经了人生的悲欢起伏，告别了年轻时的气冲斗牛之后，我开始了“百姓秋叶”丛书的工作。我坚信它的价值。无论如何的荆天棘地，怎样的筚路蓝缕，我都将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三十年前读过并牢记的青年马克思的一段话，将一如既往地鼓励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在我们的遗骸前，高尚的人们将洒下他们的泪水。”

花 蕾

2011年春，于梦湘阁



目 录

当年,油条的长度要“达标”	谢如璧(001)
向自留地让步	吴 思(004)
彝乡军民情	姜克强(007)
挖人祖坟的报应	张甫文(013)
室内保温绝招	江宏国(015)
愤怒的地瓜	张立春(018)
我的知青岁月	郭运菊(022)
三年困难时期的锦屏矿校	王贵林(025)
赤脚医生和电工	小 海(028)
20 世纪的友好商品	时盛麟(030)
牛事	饶道良(034)
吃鼠肉	张品成(038)
“龙固事件”始末	解恒宪(042)
一夜师生情	石 飞(048)
师恩,永远难忘	王澜涛(050)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徐州日报》	张立人(055)
故乡的年味	李根萍(060)
反“封、资、修”文件	王金昌(063)



百城秋叶丛

敌机撒来的传单

防震的日子·····	夏业奇(066)
敌机撒来的传单·····	花 蕾(068)
没有“反党言论”的右派·····	张 昕(070)
早春登岛斗苏修·····	沈 坚(072)
娘的回忆·····	程安振(079)
“起死回生”老头衫·····	吴绳文(082)
军营风格的“儿童乐园”·····	高 源(083)
人口普查与世界杯·····	王恩翔(084)
001 号电车 ·····	仲 毅(085)
解放初南京妓业九次大调查·····	于曰良(088)
香烟的记忆·····	毛丽萍(091)
念着老童谣,想起我的兄弟姐妹 ·····	陈 英(096)
那时营养汤·····	于 峰(098)
看古巴人跳水·····	陈光新(101)
碎砖头和三元钱·····	王庆顺(102)
最后一个寻呼台·····	傅周艳(103)
自制葡萄汁·····	宋燕玲(106)
电影“跑”片·····	桑万邦(107)
夏天单位发草帽·····	傅炳立(110)
当年跳舞热·····	施向辉(112)
“喇叭头”里听刘兰芳·····	张智峰(117)
股市二十年之营业部变迁·····	王海燕(119)
倒马桶的最后一人·····	汪 薇(122)
“双枪老太婆”被劝退党·····	轶 名(125)



当年的特产“活页文选”	戴传纲(130)
春天里,排队吃蒜头	王 强(131)
1997 年,用手机还得配“执照”	曾亚莉(134)
南京的街头挖耳匠	刘 蓉(135)
老宅	张 芸(137)
新街口曾经的“楼歪歪”	徐 印(140)
三十多年前的购物证	黄 韬(141)
曾记否,买菜直接去菜地	江宏国(142)
校园逸事三则	蔡晓鹏(145)
绑架记	张大青(149)
从卜姓读法说开去	卜新民(157)
一代人心中的“东方红”	骆小元(161)
东风二楼 349 办报记	杨大明(164)
我与书的情缘	杜吉华(169)
中秋联欢会	许继嵩(171)
山色不随春老	谢声显(176)
军旅生涯的两个见闻	杜康隆(184)
六盘山情结	吴工圣(188)
那一片消失了的森林	戚云龙(192)
1966 年 8 月的日记	王行国(196)
我参加过“投机倒把”	唐龙潜(204)
我的“造反”经历	武玉栋(209)
我考上了郑州一中	葛有彦(214)
夏工宣	何 蜀(218)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费 明(223)
银岭的情怀·····	高永伍(225)
20 世纪的自行车 ·····	谷万中(229)
我的一些记忆碎片·····	尤九州(232)
永远的“三线”·····	刘 昕(235)
母亲的纺车·····	赵志存(238)
四斤面与八年徒刑·····	袁成兰(242)
编后记·····	(245)





谢如璧 男，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籍贯云南省楚雄市（现楚雄彝族自治州），194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市。1948年初，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南京定居。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6年，先后任战士、副班长、部队文工团创作员，受部队嘉奖5次，荣立三等功2次。1968年退伍分配到南京汽车厂工作，一直从事企业政工工作，业余时间酷爱写作，已先后在全国数十家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类作品上万篇。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佛城西路江南青年城 A1 幢 206 室 联系电话：18061657442、13057588818

当年，油条的长度要“达标”

说到“诚信”，老南京人就会想起早在 50 年前南京市场上的公平交易做买卖的往事，以及对不法商贩的打假行动。虽然涉及的都是身边的小买卖，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旧事重提，也颇有借鉴意义。

烧饼油条有“标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市民的消费水平还很低，市场上没什么贵重的家用电器可卖，就是有，大家手头也没有钱去买。

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集中在吃、喝、穿、用等小宗商品的买卖上。

但就是对这些小宗商品买卖，当时也很讲究诚信。我印象很深的是，连老百姓每天吃早餐，买的烧饼油条，有关部门也进行明码标价，另外还标明重量。



百姓秋叶

敌机撒来的传单

笔者当时住在鼓楼，我家旁边的鼓楼街是商业街，很热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光卖烧饼、油条的店铺就有三四家。

每家贴烧饼的炉子和炸油条的大锅前，都贴有标明价格和重量的标牌。

我还记得，当时每块烧饼的价格为2分钱，收粮票1两。油条每根价格1分钱，收粮票5钱。市场主管部门规定，每一根油条的长度为28至30厘米，直径2厘米，不达到这个规格的油条，不能卖给消费者。

除烧饼、油条外，当时市场上所有的小吃也是明码标价、明确标重。1角1分钱一碗的馄饨，规定一碗必须为16只馄饨，每只馄饨下锅前重量为3钱。另外还特别规定，馄饨汤要用骨头来煮，作料必须有虾皮、蛋丝、小葱、榨菜等。

1角3分一碗的大肉面，除了标明收粮票2两外，还标明下锅的面条必须为3两，作为“浇头”的大肉，其重量不少于1两5钱等。

有了明码标价和标重，市场上小吃、食品、小商品等经营都按规定来操作和营业，合法盈利，非常诚信，没有出现过非法盈利的行为。

菜场设有“告秤”处

当年，为了防止店铺发生短斤少两的现象，几乎每家菜场、商店里，还特地设置“告秤”（南京话，复秤的意思）服务处。

顾客如果发现自己所购买的商品分量不对，就可前去“告秤”。如果少了，就向菜场或商店领导反映，不仅能追回损失，而且能让售货员被批评甚至受到处罚。

那时用的秤，都是传统的木杆秤，后来发明了托盘秤，卖食品的商店的“告秤处”用的是托盘秤，而菜场里的“告秤处”，使用的是传统的木杆秤。

我记得，鼓楼菜场曾发生过一次“少秤”事件。一位家住菜场隔壁的杨大嫂，听说菜场来了新青菜，就赶紧排队买了3斤，回到家，她就急着去打井水洗菜，打完井水，拿来自家的秤一称，发现竟然少了2两多。

当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购物在10斤以下，复秤误差在1两以内的，不作计较，误差超过1两的才为“少秤”。

杨大嫂当然不肯罢休，赶紧带着菜，到菜场“告秤”，发现果然少了2两半。她找到菜场领导，不仅补足了分量，还当场批评了那位“少秤”





的售货员。

下午,杨大嫂的女儿放学后告诉她,她上学前看到家里买了青菜,就想起学校里教学用的小白兔,于是拿了一棵青菜带到学校去喂小白兔了。

杨大嫂恍然大悟,赶紧又跑到菜场找领导。解释“少秤”的原因并道了歉。菜场领导并没有责怪她,只是说:“只要不是我们工作失误就行了!”

管理人员常“暗访”

当年的市面上,还有这样一景,不管是早市还是晚市,戴着红袖章的工商管理人员穿行于各家店铺,不时拿出手中的秤,对照店铺商品的明码标价和标量数据来核对,发现误差,就喊来老板询问,及时指出并要求立即改正。

1980年代初,在一家新开张的面馆,我就遇到一件工商管理人员“微服私访”的好玩事情。

一位检查人员穿便服进店花了1角4分钱要了一碗三鲜面,伙计端上后,他并没有立即吃,而是又要来一只干净碟子,将面里的三鲜(木耳、皮肚、香肠)一一挑出来,对照食谱标价表数了起来:3片木耳一片不少,5块皮肚也不少,但规定必须要8—10片香肠却只有6片。

他立即招呼伙计前来询问,那位新来的伙计还不服气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小儿吧叽(南京话,小家子气意思)的?”管理人员立即掏出工商管理证件给他看,并叫老板来。老板一到就马上明白了,直接说“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

那时,工商管理人员很负责任,去小吃店“微服私访”也都是自己掏钱。他们对待商贩的态度也很和蔼,现在新闻报道中偶尔能见到外地城市市场管理人员冲砸摊位的事情,当年从没有听闻。

当年鼓楼有一家牛肉锅贴店做的锅贴特别好吃,就是免费提供的醋是加过水的,有群众向工商部门反映,管理检查人员暗访后果然如此,问店老板能不能不加水?老板回答:“一瓶醋一角钱,一两锅贴才5分钱,有顾客随手倒这不花钱的醋,往往浪费掉,我们的成本太高了。”管理人员一想,也有道理,就要求他们:一是加强控制,由店家倒醋;二是适当加点水可以,但一定要加冷开水,不能加生水。店主当即答应,基本上是按第一条意见执行。

吴 恩 男,1957 年生于北京,插队时当过两年生产队长。198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多年。1997 年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工作,现任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等书。

向自留地让步

作为插队知青,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 1976 年 5 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





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锹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

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姜克强 男,1950 年出生,江苏靖江人,1968 年 2 月参军,中共党员,1977 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服务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现任该社编审;1980 年 5 月参加农村文化月刊《垦春泥》的创刊,并在编辑部工作了 12 年;继又从事政治理论书籍和文化教育书籍编辑及审读工作。

彝乡军民情

1969 年下半年,中央为了解决四川的动乱局面,恢复城乡的生产,决定向四川派出十万人组成的军宣队,到城乡宣传中央精神,帮助组织“抓革命,促生产”。驻扎在峨边的铁道兵 49 团也接到了任务,我和另两位战友经过峨边县军管会的培训后,作为军宣组被派到以彝族为主、彝汉混居的杨河公社。

这段终生难忘、难以重复的经历,用“记忆犹新”四字还不能表达我的特殊感情。可以这么说,不到杨河我不知道少数民族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有多深;单就这段经历,我就觉得当几年铁道兵值了。我不仅仅把它当成经历,而且把它当成个人财富库存在记忆中。

小地方,大气候

去杨河公社,我们选择的是渡大渡河、经茅坪镇顺着杨河走的路线。那条路用“山道弯弯”描绘不能说准确,它还断断续续,断中有续,续中有断;用“羊肠小道”形容不算是夸张,窄的地段仅是石块上凿出的几个放脚的坑。刚开始,我们见杨河入大渡河口有近百米宽,以为这条河很大,后来发现有的地方仅几米宽不说,水也浅得不过膝;河边的路,



百姓秋叶

敌机撒来的传单

有的地方有路，有的地方根本就没路，直接在河道里的石块上跨行，忽而在河这边忽而又在河那边，一会儿攀山而上，一会儿又顺坡而下。还有类似于黄山天都峰“鲫鱼背”的路，长达上百米，不过两边有小树和杂草，没黄山那么险。我们那天到杨河，公社的同志并不知道（公社虽然有一部电话，但当时的线路是一根与广播合用的裸露铁丝线，时常不通，其他就靠半月到一次的邮递员送信，消息常常迟到）。当我们背着行李出现在公社所在地人们的视线中时，一向冷清的杨河坝立刻喧嚣起来了。之所以说是“喧嚣”，因为那不是一般的热闹，虽然公社所在地的定居人口仅只几十，但那热闹声在山间回荡反复，使我们因行山路累得憋气的耳朵顿时通透响亮起来。“家（解）放军阿莫科（彝语：工作人员）——噢——嗨！”许多人不断地重复喊。“——噢——嗨！”是彝族人在山间呼喊招呼的通常用语。山这边喊，山那边应。人一喊，几十条家犬跟着就起哄——上蹿下跳、满山呼叫，再加上最先见到我们的人已经向我们飞奔迎了过来……那场面，谁都不觉得我们之间素不相识，而是久别回乡的亲人，令我们热泪盈眶。

公社驻地叫杨河坝，是四周的山围成的“锅底”。代表公社的建筑物有四：正中心的是一座三层的木楼，除了顶上盖的是瓦以外，全由木板、木柱及木条组成。一楼是敞厅，可坐百人，供开大会用；二楼办公，有四五间办公室，公社的全部机构在此；三楼是阁楼，放几张床招待来客，也是我们的居住所在。木楼西是一栋三间带厢房组成的医院，只有两名男医生，没有护士。木楼东侧有一排五间的瓦房，是供销社和信用社。最好的建筑是木楼东南的白色两层砖瓦楼，那是杨河小学。所有建筑均无围墙，与其为伍的是彝族民居。整个杨河坝的平地面积，用现在的眼光看，拿到城市建个市民广场也不算大，但其清翠欲滴的山色、从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清澈见底且冰凉透骨的杨河湾碧水，以及近在眼前却又似远在天边的终年不化的雪山带来的山上山下四季性大气候，是全国哪座城市也没法比的。

醪糟酒，翻身情

在到杨河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民风不熟，既怕工作做不下去又怕影响民族关系，可到了杨河以后，我们发现，比预想的要好

